

副文本在翻译中的多维建构与时空解读

刘亚燕

(龙岩学院 外国语学院, 福建 龙岩 364012)

摘要: 副文本是翻译研究中不可忽视的一部分,翻译中的副文本为跨文化视域下的文本接受提供了丰富的参照和广阔深入的诠释空间。日本的文学杂志《中国现代小说季刊》是日本译介中国当代文学作品的主要阵地之一,副文本的内容复杂而又流动,基于多重的维度对其进行考察,同时超越文本的时空性加以解读,以阐明副文本在译本理解和接受过程中的辅助作用。其中,多元主体的“显身”体现宽广的言说空间,折射出复杂的意识形态,拓展了阐释的纬度;文本间性的呈现和外部信息场的构建也提供了广阔的指涉范围,通过信息的挖掘和利用,可以丰富译文的意义,消解跨文化“陌生感”。

关键词: 翻译副文本; 时空解读; 主体彰显; 文本间性

中图分类号: H059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672-0962(2018)04-0029-07

一、引言

副文本研究是翻译研究中不可忽视的一部分,虽然副文本只是正文本的延伸和辅助,却为正文本提供了丰盈的时空环境,创设出主体彰显和交互的氛围。“外域文化的异质性拉大了目的语读者与原文之间的距离,由于历史及文化的障碍,造成了目的语读者在阅读原作某些部分时‘阐释能力’的缺失”(孙艺风,2004:46)。译本中的副文本为跨文化视域下的文本接受提供了丰富的“参照系”。“副文本这一概念由法国文论家热拉尔·热奈特于1979年在广义文本之导论中首次提出”(热拉尔·热奈特,2001:71-72)。他对副文本现象和价值进行了系统的介绍和分析,指出“副文本是用来展示作品内外一切材料的域界手段与常规,在作品、作者/译者、出版商和读者之间起着复杂的斡旋作用”(Kansu,2012:14)。副文本概念刚开始主要应用于文学研究领域,近十多年来国内外学者已开始关注副文本之于翻译研究的重要意义和价值。副文本在翻译研究中的涵义得到了重新界定:“我们将副文本视为任何与核心文本关联的、附加的、或者外在的材料,它们的作用在于解释、界定、指示,或者支持、补充背景信息以及学者、译者与评论者的相关观点和态度”(Valerie,2013:1)。“副文本为深刻理解译作的产生与接受提供了价值参考,是翻译史研究中一个主要的史料来源”(Theo,2007:47)。“对于翻译文本的副文本因素的分析研究能够揭示出翻译文本本身所不能揭示的东西”(Theo,2007:59)。值得一提的是,国际翻译专题研讨会近年来出版了两部以“翻译中的副文本因素”为主题的论文集:《翻译外围:翻译中的副文本因素》(*Translation Peripheries: Paratextual Elements in Translation*)通过个案研究从多角度探讨了副文本在翻译研究领域发挥的积极作

收稿日期:2017-06-15

基金项目:福建省教育厅社会科学A类项目“中国文化走出去战略背景下汉日翻译策略的多维透视”(JAS160533)。

作者简介:刘亚燕(1979-),女,福建龙岩人,硕士,龙岩学院外国语学院副教授,研究方向为文学与翻译。

用;《翻译中的文本、外文本、元文本和副文本》(*Text, Extratext, Metatext and Paratext in Translation*)考察翻译过程中各种媒介构建副文本要素的方式。与此同时,国内学者的相关研究悄然而起,将副文本概念引入到翻译文学领域,主要有孙昌坤(2005)、修文乔(2008, 2015)、文月娥(2011)、肖丽(2011)、贺赛波(2013)、蔡志全(2013, 2015)、邵霞(2016)等。国内的研究焦点主要集中于:(1)考察译本中的副文本类型和功能,挖掘副文本中各种构成元素和相互之间的联系。(2)以副文本为研究工具,通过个案的质性分析,把握译者的翻译观和翻译思想。(3)以翻译的外部环境为切入点,通过副文本理论,阐释译本产生的历史文化语境和在目的语环境中的接收机制。

综上,副文本理论在翻译研究中的应用既拓宽了副文本理论的研究模式,又为翻译研究的文化转向开辟了新视野。然而,由于从副文本理论视角进行翻译研究的历史尚短,当前的研究尚属不足,有待于从以下三个方面进一步推动:(1)“现有研究仅选择单个译家、译作作为研究对象,缺乏对某一时期多篇译作和译者群体的关注”(修文乔,2015)。(2)“真正大规模的量性研究并不多见”(耿强,2016)。(3)需要进一步拓宽研究对象,即今后的研究应从英汉翻译的研究逐步向其他小语种的翻译研究拓展,不仅要研究外译汉文本,也要研究汉译外文本。鉴于此,本文搜集中国当代文学的日译作品,以其中的副文本为对象进行描述性分析,关注当代文学日译的译者群体,进一步挖掘和探索副文本对于翻译研究的作用和意义。在日本,文学杂志是译介中国当代文学作品的重要阵地,《中国现代小说季刊》当属这一领域的执牛耳者。其创办于1987年,至2005年停刊的十八年间出版了两卷,共七十二期,每期含数篇文学翻译作品。该文学杂志由“中国现代小说刊行会”编,日本苍苍社出版,积极关注中国当代文学的新动向,“重点介绍并翻译文化大革命以后的中国当代小说,前后共介绍了一百四十多位作家,共三百二十多篇作品”(张元,2013),为中国当代文学作品在日本的传播和发展做出了重要的贡献。后记是副文本的重要组成部分,为译本的研读提供了多元的向度。本文以语料中的“译者后记”和“编者后记”为研究重点,以期拓宽副文本在翻译研究中的阐释空间。

二、翻译副文本中多元主体的“显身”

翻译涉及的主体众多,除了译者之外,还有原著作者、源语原著读者、评论者、翻译策划编辑者和出版商以及译语读者等与翻译相关的人。他们在迥然有异的主体性发挥中构成了复杂的主体系统,是副文本解读不可忽视的要点。副文本中主体“显身”,介入翻译,是对翻译过程中“隐身”的一种“对抗”性表现。《中国现代文学季刊》译后记中通过直接阐述或间接引述表现出各主体与翻译之间千丝万缕的联系。不同主体的个体观念和感性体验有了不凡的凸显,主观能动性得到了积极的发挥,各自的价值得以相应的彰显。

(一)译者主体的自我彰显:指向文本内部的受动与能动

译者在翻译中的主体地位的重要性自不待言,在正文本中译者通常是隐身或自我淡化,而副文本为译者提供了充分现身说法的平台。从《中国现代小说季刊》后记语料的观察和分析发现,译者在副文本中可以直接发出自我声音,展现个体体验,透露翻译思想和策略,充分体现了译者个性化的独特存在和发挥主观能动性的过程。译者在翻译中的主体性彰显存在于翻译的每一个活动环境中,或聚焦于局部,或着眼于整体。与此同时,它还体现出受动性和能动性的双面特征,其中,受动性表现为翻译过程中产生的特有的自我体验,而对文本的择取和翻译策略的采用则是其能动性行为的明显标志。

《中国现代文学季刊》译后记中,不同译者面对不同作品在主体性彰显上有着不同的呈现。首先,译者作为一个异质性个体,在翻译过程中以自己的意识活动,创造了一个充满情感、直觉、观念的受动性身体体验。例如,金子子和子(金子わこ)翻译《磁瓶》(星竹:《花瓶》)中“感觉翻译犹如登山,‘风景优美’的原作,翻译起来‘不识庐山真面目,只缘身在此山中’,困难重重,倍感艰辛。”竹内良雄在《用意はいい?》(戴

来:《准备好了》)的译后记中谈到曾根据作品主角是一名即将步入老年的男子推测作者是与主角年龄相近的男性,而实际却大相径庭,作者是名年轻女性,对此颇感吃惊。田畑佐和子翻译《晚景》(范小青:《晚景》)谈到由于自己处于晚年的缘故,翻译过程中情感上出现了起伏,怀念和悲伤之情油然而生。樱庭由美子(樱庭ゆみ子)指出翻译《アダムとイヴと》(严歌苓:《也是亚当,也是夏娃》)的过程中对原作的评价逐步产生了变化,甚至对是否值得一译产生疑虑。由此,译者在副文本中流露意志,表达个体体验,体现了其个性化的主体存在。

其次,“翻译策略的选择不仅与语言内部的认知规律紧密关联,并且和语言外部主体的心理思维和社会文化等动因密切相关”(刘亚燕,2016)。文本的择取缘由和意图,翻译方法与策略的选择和操控均反映了译者主观能动性的一面,译者在后记中出场,亮出了第一手资料,其权威性毋庸置疑。“译者翻译观对于译者的翻译思想和翻译原则,除了从译者的译著中找出答案,还可以在译者的译序跋里所表达的翻译观中窥探”(邵霞,2016)。《中国现代文学季刊》中译后记的分析有助于我们从不同译者和不同文本的宽泛角度,对译者的能动性发挥进行无限细化的捕捉,隐藏在翻译过程操作中的难点和疑点的处理方式和依据在此揭开面纱。译者土屋肇枝在《百里四方》(迟子建:《方圆百里》)中透露对于原作故事情节中的模糊部分并未采取解释性的补充说明,目的在于避免破坏原作具有的张力,而在《悲しみと私のあいだ》(王安忆:《悲伤与我》)中指出虽已了解原文中“我们”的多重隐含信息,如“我与姐姐、我与同学、我与邻居孩子”等,但在译文里还是将其硬译为“私たち”,旨在继承王安忆同期的其他作品中“我们”的叙述口吻,以契合原作者的小说观。关根谦(関根謙)对《边缘》(史铁生:《境界》)的翻译文本择取缘由进行了说明,在四个短篇成一集锦的文本中只翻译第一篇的《境界》是由于在译者看来,相比之下此篇更加完整,而其余几篇是从其他视角进行的雷同叙述。伊礼智香子在《回廊の椅子》(林白:《回廊之椅》)的译后记中解释到,为顾及读者阅读的顺畅和可接受性,努力寻找和捕捉原作者独特的感觉。同时,对于作品中括号的频用和由此产生的叙述者观点的交替,以及故事的多重结构等方面的处理可谓苦心孤诣。例如,在感觉唐突的切换场面部分添加了原文没有的破折号,为衔接下一段落内容提供间歇。由此可见,翻译中译者主体的意志活动鲜明可感,通过副文本中的只言片语掷地有声地进行了传播,让人感受到文本背后的生命流动。

(二)译者主导下的他者主体现身:放眼文本内外的多元指向

以上副文本后记的分析中不难看出译者的主体性表现得积极而又活跃,但仅此并不足以统摄整个翻译过程。“作为文本之外的重要操控手段,副文本是文本的延伸和补充,在宏观层面上对文本意义进行整体操控,引导着读者的阅读及影响着文本的传播和接受”(陈向红,2016)。译者主体并非孤立的存在,文本的阐释与建构脱离不了其他主体的介入和参与。首先,原作者对于原作意义的规定性是不可忽视的,译者以各自方式让作者主体显现。《アダムとイヴと》(严歌苓:《也是亚当,也是夏娃》)的译后记中作者严歌苓现身,通过其在采访中的回答表明作品中事件和人物的真实性,即故事是基于真实事件,亚当的原型是身边人物,作者有意借助亚当夏娃之名呈现虚构的假相。与之相反,金子和子在《妹小青を憶う》(毕飞宇:《怀念妹妹小青》)的译后记让作者毕飞宇出场,揭开了“妹妹”的原型,原来在作者毕飞宇的现实生活中并没有妹妹,是创作中的虚构,作者将作品视为“妹妹”,并赋予了自身哥哥的角色。堀内利惠的《ぬかるみ》(毕淑敏:《翻浆》)译后记中,译者引用了原作者毕淑敏在获得中国《小说月报》主办的百花奖后的讲话,透露了该作品的创作契机和过程。

相对于作者主要指向文本和创作的微观角度,编者在后记中的显形则超越译文本本身,放眼于文本外宏观层面的多元指向,以呈现意志,操控整体。《中国现代文学季刊》编者后记的内容可谓包罗万象,不拘一格。既有指向文本内的,也有指向文本外的,里应外合,为译本的解读和接受提供更加广阔和深入的诠释空间。例如,编者在第二卷里增加作品原作者对刊物的寄语,第二卷第二十五期开始注入视觉化元素,添加原作者的肖像照,以丰富文本结构,增强文本的立体化呈现。有关该杂志的編集目的,编者明示了其意图和基本方针,即搜集和翻译各类作家的优秀作品,展现中国人们的生活、特有的社会构造和人际关系等,

借此向日本读者打开了解中国的窗口。而关于《中国现代文学季刊》译本的生产环境,编者痛感中国当代文学在日本的介绍和译介屈指可数,译本走向读者来之不易,依靠的是译者群体在不利的出版逆境中,坚持不懈地默默付出。译本的接受性方面,编者后记中介绍了以日本大学生为对象进行的调查,虽然人各有异,但都与接受主体的阅读经历和对中国社会背景的了解息息相关。对此,编者的感受“有喜有忧,喜在不少读者反馈从中感受到了乐趣和共识,通过了解中国文学进一步拓展知识,忧在于翻译的质量对文本接受的决定性影响,深感译者责任之重。”后记中编者的现身彰显了其在译本生产过程中的主体性发挥,同时透过字里行间凸显文本的价值,让读者从更加宏观的层面把握和了解文本。

读者接受是文本价值体现之所在,读者反应是衡量译文质量的关键因素。虽然译者在选材和翻译中充分顾及读者的接受,但每个读者都是独特的、具体的,有着独立的思考,自然期待视野也不尽相同。通常读者是作为潜主体的存在,而《中国现代文学季刊》译后记中,原作读者和译文读者均有现身,其中译文读者的声音犹如空谷足音,弥足珍贵。伊礼智香子在《瓶の中の水》(林白:《瓶中之水》)译后记中显现了原文读者对林白作品的反应,“林白的诗人朋友喜欢《回廊之椅》,而评论家们则更钟情于《瓶中之水》。”樱庭由美子在翻译严歌苓作品的过程中重新审视其翻译价值,并在前半部译文出炉后听取了读者的感想,结果毁誉参半,好评者的理由是“读得开心,有所触动,细微处的描写让人印象深刻。”而认为“不好看”的理由在于“缺乏主题性,题材司空见惯,存在许多累赘、陈腐和刻板的表达,不具中国色彩。”译后记中读者的主体性言论无疑为其他接受主体的解读提供了参照。综上,副文本通过非虚构的翻译“口实”,折射出相关主体复杂的意识活动,深入还原翻译过程中的立体面貌。

(三) 主体间的“共在”显现:特定时空环境下的开放性话语实践

主体的本质属性体现为个体的异质与主体间的共在。主体和主体间性之间并无泾渭分明的界限。副文本译后记为主体性的彰显提供了重要的平台,而主体性的发挥是以主体间的“共在”为前提,在交流互动的交互关系中相互作用和影响才得以实现。“主体间性从标准意义上而言,指个体之间通过实实在在的信号交流达成一致确认;从精神意义上而言,指个体之间互相对文本生成的心理上的投入和参与;从本体论讲,则是指个体之间的互相提升和约束”(陈大亮 2004)。副文本为作者、译者和读者等主体间的交互提供链接的通道。主体间性反映了特定时空环境下的一种话语实践,各个主体在副文本这一充满活力的开放性的“共在”场域中相互碰撞,并进行协调和建构,努力探寻自我与他者之间的连接点,以获取共识和认同。

“副文本为作者、译者、读者、编辑、出版商、原文、译文等诸多元素提供了交流场域,并为研究他们之间的关系提供了参照系”(修文乔,2015)。《中国现代文学季刊》译后记中,主体间性的表现有双向度和单向度之分,直接性与间接性之别。双向性较为直接,是以主体之间的现实在场为前提,通过面对面、或邮件、电话等方式跨越空间,取得了实际的即时性沟通效果。由于《中国现代文学季刊》译本的生产基于一定的共时性,译者与原作者、译者与读者、译者团体等主体之间的直接性双向交流和互动屡屡可见。金子和子在《妹小青を憶う》译后记说到为解决心中难以释怀的疑问,写信给作者毕飞宇进行询问。近藤直子在翻译《新生活》(残雪:《新生活》)中介绍到,译者在原作创作期间便得以机会与作者促膝交谈,了解其中部分情节。此外,译本的成功生成并非完全依靠译者的单打独斗,译者群体之间的沟通和交流必不可少。译者栗山千香子在翻译《ねえ、雪見に来ない》(迟子建:《朋友们,来看雪》)中表示经常通过研讨会与同仁就翻译的文本文体方面进行讨论,并阐释了译为书信体的依据。立松升一(金松昇一)翻译《市井の人々》(冯翼才:市井人物)时也煞费苦心,期间吸取了诸位同行的意见和建议。主体间性的单向性表现较为间接,由于时空上的交错或断裂,需要对交流中的对象潜主体进行预设。译后记中,译者们还可向未来读者发出信号,或提供信息,或询问感受,意义归属指向接受主体,以留给他者主体思考和解读的时间与空间。土屋肇枝叶在《悲しみと私のあいだ》(王安忆:《悲伤与我》)中提出“可以让了解六十年代上海的读者回味无穷,但也能让其他读者被其魅力所吸引吧。”伊礼智香子在《回廊の椅子》(林白:《回廊之椅》)

中讲到“读者若能细细品味和阅读便是译者之万幸。”此外有译者采取移情手法,如久米井敦子《秀色》(铁凝:《秀色》)译后记中从日本读者视角出发,指出“中国农村和沿岸城市的差距是超乎日本人想象的”,以拉近和读者间的距离,引发读后共鸣,反映其强烈的读者意识。译者和编者在后记中多处阐发感想,并询问读者们的看法,以期从他者内部视角出发,顾及他者之所见,达到某种“共在”的趋近和体认,为文本的接受带来了有益的互补。

三、文本间性的呈现和外部信息场的构建

副文本除了为相关主体提供宽广的言说空间,彰显主体性之外,还通过广阔的指涉范围,提供大量的事实性信息。文本的创造并非平地而起,文本的接受也不能涣漫无边,这些都依赖于文本外部具象的时空网络。“文本的‘所指’是一个意义世界的投射”(阮晶 2013)。文本的外部网络纷繁复杂,反映时代的差异性,也体现了空间的具象性等。《中国现代文学季刊》的副文本后记通过文本间性的呈现和外部信息场的构建,呈现广阔的指涉范围。

(一) 文本间性的呈现:拓展阐释纬度,消解跨文化“陌生感”

任何文本都不可能是脱离其他文本的自足存在。“‘文本间性’,或称‘互文性’,最早由法国女学者克里斯蒂娃明提出,通常被用来指示两个或两个以上文本间发生的互文关系。它包括:1)两个具体或特殊文本之间的关系;2)某一文本通过记忆、重复、修正,向其他文本产生的扩散性影响”(陈永国,2003)。译本是原著经跨语言转换后的文本产物,相互之间构成了高度指涉的恒定间性关系。翻译中的文本间性并不囿于此,副文本中译者发幽探微,阐发跨文化视域下的原著和译本与其他文本之间的指涉关系,以探寻其中的微旨精义。文本是意义可被解码的符号,在范围上除了典型的书刊文本,还可延展为视听、口语等文本。《中国现代文学季刊》译后记中,文本间性不仅揭示了其他文字文本在正文中的直接引用或导入,还可从更加宽泛的文本层面进行阐释。(1)再现主旨相似之他者文本以升华该文本之主题:竹内良雄在《待ちながら》(戴来:《等待》)的译后记中结合法国作品《等待戈多》,太宰治的“人生有四分之三是在等待”,以及以等待为焦点的夏目漱石后期三部曲等内容,将主题升华为“等待是人生的一大要素。”堀内利惠在《北国まで》(徐岩:《列车向北方》)译后记中提到该作品特点使其联想到了高岛裕的诗歌“失ったもの とりかえすもの 取りかえしつかないもの ずっと変わらないもの(失去之物,挽回之物,无法挽回之物,永恒之物)”。鹭巢益美(鹭巢益美)在《めぐり会い》(西飏:《当孤独遇到寂寞》)中提到,“作品主题来自蔡琴的歌名,如果去听蔡琴和朱哲琴的歌曲对这部作品也许会有别样的感受。”翻译副文本中,文本间性的呈现体现了“文学中普遍的价值来源,为本民族和全人类所共同享用”(王宏印 2004:38-41)。我们应该跨越文化障碍寻求人类共同的主题。(2)联系原作者的其他文本,烘托其作品的共性和魅力所在,获取原作者的整体印象:金子子翻译谈歌的《大厂》,在后记中列举了其近作有《年底》《大忙年》《天下大事》《車間》等,这些作品“反映原作者的选题和创作主张,紧扣国家建设的重要课题和人民关心的大事,吸引了众多读者关注。”鹭巢益美则将作家西飏的作品《夜游》与《当孤独遇到寂寞》进行对比,指出主人公在身世、工作和生活上形成的鲜明对照。此外,“作者还撰写剧本,细心留意,可发现其部分短篇小说似乎也可以直接当作剧本使用。”由此,译后记中的信息加深了读者对原作者和作品风格的整体了解,进一步扩展了读者对中国文学的认知纬度。(3)启用异质文本,进行参照对比,意义和作用不容小觑。文字文本的译本和视觉文本的电影如能同期呈现,其效果不言而喻。第一卷第五期编集后记中介绍了田畑佐和子翻译的《新米先生てんまつ記》(阿城:《新米老师》)和千野拓政翻译的《紅夢》(苏童:《妻妾成群》)都已改编成电影,并在日本上映,片名为“子供たちの王様”和“紅夢”,销量可喜。述平的《有话好好说》在译文《キープ・クール》发表的同年由张艺谋导演的同名电影在日本上映。异质文本间形成互利共赢关系,从而进一步推进了文学与文化的输出。(4)为有源可寻的文本追本溯源:堀内利惠在《禍神——江

南の秘め事》(朱文颖:《花杀》)中介绍其取材于古典文学清代沈三白的《浮生六记》。饭冢容在《あの世の契り》(王安忆:《天仙配》)译后记中指出该题名出自中国民间传说的原题,以安徽省的传统地方戏剧“黄梅戏”而得名,并对其中情节进行了简要的介绍。鹫巢益美译《神の座》(李冯:《俎》)中,说明了故事主人公的背景,有民间信仰崇拜之神妈祖,还有来自古典文学《西游记》《水浒传》的人物,以及民间传统题材牛郎织女等。翻译研究中,文本间性并不局限于原文和译文之间,还包括与原文和译文发生直接指涉关系的所有文本。文本间性体现了文本间的互现和互涉关系,拓展了阐释的纬度,在一定程度上消解了跨文化“陌生感”。

(二) 外部信息场的构建:洞悉宏观的社会文化,浸透微观的个人“先验”

翻译是一种跨文化的交际活动,原语的创作主体与译语的接受主体由于在社会文化、思维观念、个体经历上存在“陌生性”和差异性,相互之间构成了时空环境上的外位性立场,从而导致文本阐释和传播的障碍。而翻译中的副文本可通过洞悉宏观的社会文化现实和氛围,浸透微观的个人“先验”,如社会背景和阅历色彩等以缓解读者接受的不畅。《中国现代文学季刊》的副文本后记中对外围场域的关照折射出了一个同时期的社会存在模式、舞台背景和主体“前结构”等外部信息。堀内利惠在《助太刀》(毕淑敏:《捉刀》)翻译中,阐述了作者的生平经历和作品中西藏的军队生活、医疗主题和亲子感情三大内容之间的联系。朱文颖《花杀》的译者堀内利惠在《禍神——江南の秘め事》后记中透露舞台就是作者居住的苏州,其中地名非虚构,均为苏州的具体地名。伊礼智香子在《回廊の椅子》译后记中推断文本中的视角描写、场面的切换、电影名的出现,演员等若干电影元素,都与其在电影制片厂的工作经历不无关联。土屋肇枝翻译的在《悲しみと私のあいだ》中透露作品是以作者为原型的少女三部曲。田畑佐和子翻译《娘ごころ》(刘庆邦:《女儿心》)中,从宏观上介绍了中国独生子女政策影响下的农村现象,男女比例失调,男性结婚难等社会现实。竹内良雄翻译的《用意はいい?》(戴来:《准备好了吗?》)中介绍了社会背景,不同于日本的中国特有的亲子之情,父亲对儿子的人生方向产生了重大影响。文本的接受形式和效果与受者的知识框架,经验图式、社会文化、意识形态等资源密切相关,翻译中的副文本在一定程度上消解了跨文化语境下他者形象或异域空间的干扰。副文本通过信息的挖掘和利用显化了正文本效果之下隐藏的背景资源和内在生命,使得文本的内在与外在得以衔接和连贯,从而营造了较高等度的接受环境。

四、结语

随着翻译研究的文化转向,研究对象日趋多元化,他超越了传统的语言学派译文研究,向宏观的社会文化语境拓展。副文本是译文的延伸与扩展,在翻译研究中不可或缺,它涉及的内容复杂多样,且无确定边界。积极开展翻译的副文本研究,剖析文本和语境的协调关系,探寻其中折射出的复杂意识形态,有利于丰富译文阐释纬度,推动跨文化的传递,从而为中国文学走出去的主动译介提供一些启发。本文以《中国现代文学季刊》中的后记语料为分析对象,系统地归纳和梳理了翻译中的副文本所呈现的内容。副文本是具有复杂性和流动性的弹性空间,丰富了译文的意义。首先,它为相关主体提供宽广的言说空间,通过主体性和主体间性的彰显,感性体验有了不凡的显现,主观能动性得到了积极的发挥。此外,副文本借助广阔的指涉范围,通过大量的纪实性和真实性描述,提供了事实性信息,吐露了社会历史本质。其中,文本间性的呈现拓展了阐释纬度,消解了跨文化“陌生感”,而外部信息场的构建则是浸透了微观的个人“先验”,同时有助于洞悉宏观的社会文化。由于副文本涉及的内容复杂多样,呈现方式常常受到生产环境和接受模式的影响,还有待于进一步拓宽研究对象,进行更为深入的思辨性研究。

参考文献:

- 蔡志全. 2013. 副文本理论及其在翻译研究中的现状述评[J]. 海外英语(5):140-142.
蔡志全. 2015. “副翻译”:翻译研究的副文本之维[J]. 燕山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4):84-90.

- 陈大亮. 2004. 谁是翻译主体[J]. 中国翻译(2):5-9.
- 陈向红. 2016. 文本之外的操控——《新小说》杂志中翻译小说副文本研究[J]. 当代外语研究(2):75-79.
- 陈永国. 2003. 互文性[J]. 外国文学(1):75-81.
- 耿强. 2016. 翻译中的副文本及研究:理论、方法、议题与批评[J]. 外国语(5):104-112.
- 贺赞波, 申丹. 2013. 翻译副文本、译文与社会语境——女性成长小说视角下《大地的女儿》中译考察[J]. 外国语文(1):109-113.
- 刘亚燕. 2016. 翻译中省略的认知运作与主体关照——以外宣翻译作品《中国文化读本》为例[J]. 浙江理工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5):474-480.
- 阮晶. 2013. 副文本在翻译研究中的应用[J]. 牡丹江大学学报(11):132-134.
- 热拉尔·热奈特. 2001. 热奈特论文集[M]. 史忠义, 译. 天津:百花文艺出版社.
- 孙昌坤. 2005. 简论译作序言跋语对于翻译研究的意义[J]. 上海翻译(1):54-55.
- 孙艺风. 2004. 视角阐释文化(文学翻译与翻译理论)[M]. 北京:清华大学出版社.
- 邵霞. 2016. 副文本与翻译研究——从序跋角度窥探小说翻译[J]. 西华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3):85-88+95.
- 王宏印. 2004. 试论文学翻译批评的背景变量[J]. 中国翻译(2):38-41.
- 文月娥. 2011. 副文本与翻译研究——以林译序跋为例[J]. 北京科技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1):45-49.
- 肖丽. 2011. 副文本之于翻译研究的意义[J]. 上海翻译(4):17-21.
- 修文乔. 2008. 从傅译副文本看傅雷的翻译观和读者观[J]. 广东外语外贸大学学报(6):66-69.
- 修文乔. 2015. 社会语境与译者参与——以鸳蝴期刊《礼拜六》翻译小说的副文本为视角[J]. 外语研究(3):81-86.
- 张元. 2013. 中国当代小说在日本的译介与传播[J]. 文艺评论(5):62-66.
- BARDAJI A, ORERO P, ESTEVA R S. 2012. Translation Peripheries: Paratextual Elements in Translation[C]. Bern: Peter Lang AG.
- HERMANS T. 2007. Cultural Transgressions——Research Models in Translation Studies II: Historical and Ideological Issues[M]. Beijing: Foreign Language Teaching and Research Press.
- PELLATQ V. 2013. Text, Extratext, Metatext and Paratext in Translation[M]. Cambridge: Cambridge Scholars Publishing.

A Multi-Dimensional Study on Paratexts in Translation

LIU Yayan

(College of Foreign Languages, Longyan University, Longyan 364012, China)

Abstract: As an indispensable part in translation study, the paratextual messages provide rich reference and deep interpretation space for textual acceptance in intercultural perspectives. Japanese literary magazine *Chinese Contemporary Novels (Quarterly)*, whose paratexts are complex and fluent, is an important medium for the translation study of Chinese literature. The multi-dimensional subjectivity provides broad comment space, reflects the complicated ideology and expands the latitude for interpretation as well. On the other hand, the presentation of intertextuality and construction of external information offer a wide range of reference. Through digging and using the information, the meaning of the translation will be enriched, and the strangeness from cross-culture eliminated. This paper concludes that paratexts play a helpful and supplementary role in facilitating comprehension of the translation, by putting it in a multi-dimensional web, and interpreting it beyond the space-time of text.

Key words: translation paratext; space-time interpreting; subjectivity; intertextuality

[责任编辑:萧怡钦]